

117

文成文史資料

第二輯

文成縣政協文史資料工作委員會編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

K295.50328

H4

V.2

505

目 录

- 文成县第一所中学建立及其演变……………陈 夫(1)
- 私立承文完全小学……………陈圣庆(7)
- 广益小学~兼记民国初期大岙镇几所小学…陈 夫整理(10)
- 忆英大财专在中堡、龙川……………诸葛平(15)
- 却话浙东三临中……………赵祝炎(18)
- 联高在南田……………陈夫执笔(26)
- 温中分部在三滩……………刘际松(34)
- 忆瑞安西区小学生运动会……………赵超植(39)
- 名噪一时的飓风篮球队……………赵超植(42)
- 抗日战争时期南田学生运动……………刘久持(46)
- 文成县诞生·回忆鳞爪……………刘兆祥(53)
- 回忆碧湖起义前后……胡永孚口述周志厚 胡克守整理(61)
- 大岙镇商会沿革概况……………刘伯超(76)
- 大岙镇电灯厂创办前后记略……………张雨明整理(80)
- 日军轰炸大岙街目击记……………陈 夫(86)
- 忆我的伯父叶均居士……………叶方贵(92)

文成县第一所中学及其演变

陈 夫

本世纪三十年代末期，文成县（指原瑞安县西区和青田县南田区）已有高级小学多所，其中如群益小学、承文小学、龙川小学、南田小学、雅庄小学、周墩小学等都很出名。每年都有大批高小学生毕业。但是，在这现属文成县管辖范围的八个都一千多平方公里境内，却没有一所中学，高小毕业的学生，只有少数家道富裕的子弟，才有条件到瑞安、青田、平阳、温州等地去读中学，而大多数学生只能因此辍学。

当时正值抗日战争紧张时期，大片国土沦陷，大批居民和机关单位不断地向山区、内地搬迁。文成是山区，尚未受到敌人的直接蹂躏，反而空前地闹热起来。这种客观的形势，促使我县创办中学。

一九四一年春，大岙教育界热心人士周国春先生，刘子怀先生等人在蟾背山王家宗

祠(现县政府民政局、文化局、卫生局办公处)创办了我县历史上第一所初级中学,取名“瑞安县战时中学”,招收新生一个班,就在王家宗祠中堂上课,老师有周国春(国文)刘子怀(数学、生物)陈立中(英语、音乐)陈益斋(体育)等人。为了争取经济上的补助,这所中学特邀当时瑞安县县长吕律为挂牌校长。

就在这所中学上课后二个多月,四月十九日,日本侵略者在瑞安登陆,瑞安县城陷于敌人的铁蹄之下。瑞安中学被迫停课解散。暑期里,经过协商,瑞安县战时中学由瑞中接办,改校名为“瑞安中学大岙分部”,将战时中学的学生和原西区在瑞中本部读书的学生合并在一起。同时,在蟾背山兴建校舍。同年秋,招收初一新生。

瑞中大岙分部第一任主任是龙川赵熙先生,继任的主任有滕承基(乃平)先生,胡旭(哲民)先生,陈普民先生也担任一段时期的名誉主任。一九四二年起,每年春秋两季招收新生,直到抗日战争胜利。

我是一九四二年秋季考入瑞中大岙分部

的。当时已有秋一两个班、春一、秋二、春二各一个班，近三百名同学。老师有胡哲民（英语）、林仁远（生物）、朱国庆（文、史）、王镇生（数学、物理）、曾博夫（国文）、朱觉非（国文、）唐挚（几何）、管孟颂（音、美）、叶伯刚（体育）、金作镐（美术）、林万约（音乐）、林镜英（英语）、苏仲甫（生理、校医）、王欣山（教务员）等人。他们学识渊博，教导有方，诲人不倦，为文成县培育人才作出了贡献，令人终身感激难忘。

朱国庆老师在事隔四十六年后回忆说：当时大岷分部学风很不错，对招收新生是十分严格的，都凭分数录取，决无人情后门之类现象。朱老师是招生委员，对此感触极深，在当时许多中学出卖试卷、出卖名额的情况下，真是难能可贵的。

我记得当时蟾背山上仅建有两幢房子，一座是现县档案馆边，坐西北朝东南的平屋，三个教室；另一座是与之垂直的一层楼房，现仍作宿舍，上下各二间，共四教室。楼梯建立房子外面，楼梯头悬挂一口作为信号用的大

铁钟。老师的宿舍是山脚的张家宗祠和原战时中学的校舍王家祠堂。现县府礼堂东面公安局办公楼地基，原是学校操场，有一对篮球架和一个沙坑，平时一不小心，篮球即滚到山下现在的栖云路上，费好大劲才捡回来，当时闻名的“飓风队”、“省警队”就在这个球场上经常赛球，他们精湛的球艺吸引着广大观众。操场一角高坡上有一个用竹片作瓦，坐椅靠背用五线谱组成的“古音亭”，这是师生们唯一可以休息的地方。另一个同学们（特别是女同学）经常聚坐的地方是岭头教室外面一个小草坪，有几株油桐树，丫枝横伸出来可以坐人，树荫下凉风习习，姑娘们坐在摆动的枝丫上，哼着轻快的歌曲。

瑞中大岱分部一直办到抗日战争胜利的一九四五年秋，先后六年。与此同时，外地搬迁到文成县的中学还有在龙川的浙东第三临时中学，在南田镇的省立联合高级中学和在南田三滩的温一中初中部。这些学校都在抗日胜利后陆续迁走，由于都是借用当地的祠堂、庙宇、民房，搬走后没有留下什么校舍。教职员

也都是外地人，跟学校一齐走了。

瑞中大岙分部撤销后，大岙一批热心于教育事业的人士即在其校址上创办“瑞安县私立栖云中学”。“栖云”原是寺庙的名称，该寺在现老干部宿舍处，因中学办学经费部分是栖云寺庙产，故名栖云中学。校长陈麟如先生，老师有王鸿亨、林伯雄、林凯、林本、钟其光、钱耕莘、蒋演龙、朱家焯、周日建、夏福彬、陈圣庆等先生。

一九四八年文成县正式成立，县政府占用了栖云中学校址，学校被迫于下半年迁到苔湖头现文中校址原大岙区署后面娘娘宫里，并改名为“文成县私立栖云中学”。当时学校的实际负责人是王鸿亨先生，大岙街曾经流传过这样一首歌谣：“溪虫（子孓的俗名栖中的谐音）变蚊虫（文中谐音），蓬蒿（鸿亨）赶蚊虫（文中）”，可以反映这一段史实。一九四九年五月，文成县解放，人民政府接管了栖云中学，并改名为“文成县立初级中学”，兴建校舍，同时委派林凯为第一任校长。同年九月一

日，文成中学正式开学上课。

1968、6月

（本文蒙朱国庆老师、林凯老师、陈圣庆老师、赵群老师、赵运图同志、朱建新同志、王绍恒同志等人提供资料并参考1944年出版的《瑞安中学同学录》《栖云中学四六届同学会留念册》）

〔注〕瑞安县战时中学，也有人回忆说是“瑞安县战时中学生补习学校”。

私立承文完全小学

陈圣庆

1937年春，苔湖陈姓宗族知识分子陈一筹、陈采畴等人为了培养人才、解决本家族中家境清贫的子弟入学难等问题，召集各房房长及热心教育人士开会，决定创办私立承文完全小学。（承文是陈姓始祖久二公的别名。）将陈姓大宗祠养贤田和五房的祀田，拨出谷租五百四十余石（每石合60市斤）以作办学基金。决定凡本族子弟及外甥，一律免费入学。成绩优良的异姓学生也给予免费优待。为了学区布局合理，便于儿童就近入学，择定苔湖陈氏宗祠为校址。开六个班（高级二班、初级四班）。1938年春，正式开学上课。该校聘请学历高、教学经验丰富的名教师任教。如程旦聪、林伯雄、林植、林蕴深、周国春、叶昌衍、陈立中、叶永勃、蔡远、周兢之、赵超植等先生，都是当时有名的老师，他们都曾先后在该校任教。每学期教职员工12人，均由校长负责

聘请，工资以稻谷支付，最高的每学期32石，全年合计稻谷3840市斤，是当时全县教师工资最高的学校。

承文小学初办时，仅有学生184人。开办以来，在升学考试、各种竞赛、体育活动中均名列前茅。在1941年举办的瑞安西区小学生运动会上，夺得总分第一名，深受广大群众的好评，由此声闻遐迩，珊溪、岙口、平和、玉壶、里阳、黄坦、中樟、龙川、双桂等地的家长，都送子弟来承文小学住宿学习。经常寄宿的学生计50余人。

学校的设备也较完善。学生宿舍、食堂、蓝球场都较宽敞。文体器具如风琴、蓝球架、乒乓台、单双杠、小皮球、铅球等，一应俱全，是当时附近各小学校中教学设备最好的一个。学生数也增加到386人（补习班在内），比文成县历史最久的群益小学，也不逊色。为此，曾一度被代用为大岙镇中心小学。

承文小学是陈姓宗族私办的，它设有董事会、董事长、校长。开办以来历届董事有陈友樨、陈体苞、陈志刚、陈时夏、陈体恭、陈国

岳、陈宝蛟、陈延龄、陈锡标、陈延拱、陈仲森、陈延瑞、陈采畴、陈志飞等人。历届的董事长是陈一筹（四年），陈普民（三年），陈双仲（三年），陈永光（一年，解放后）。历任的校长是陈采畴（二年），陈圣庆（七年），陈体强（一年），陈永演（一年，解放后）。解放后，1950年与群益小学、广益小学合并为文成县立中心小学，其校舍于1952年拨给文成中学使用，1985年已拆建为文中教师宿舍。

承文小学自1938年正式上课至1950年合并，先后历时十二年，给不少儿童解决了入学问题，为我族我县培养了一批有用人才，她在我县教育史上占有一席光荣的地位。

广益小学

——兼记民国初期大岙镇几所小学校

一九〇五年，清政府下令废除科举，一时间全国办学之风，十分高涨。大岙街也和其他地方一样，继群益两等学堂创办后，一九一〇年（宣统二年），在苔湖有林绍年等创办的明达小学堂，一九一一年，又有周胜祖创办的乐群小学堂与周遇滨创办的启明女子学堂。一九一三年，陈一善在林店尾创办的广益初等学校；此外，还有陈翰秋在陈氏宗祠办的普育学堂，吴筱彝在河头殿办的岙川学堂，张进书在蟾背山脚张家宗祠办的张家私塾等，都是“三味书屋”型的私塾。

广益小学校创办于一九一三年（民国二年），校名取集思广益之意。第一任校长是陈一善先生。校址即现林店尾党校，它原是陈家宗祠，四周筑有二丈多高的墙围，校内花木极多，有木樨、月桂、芙蓉、美人蕉等，有些花木直到解放后仍然茂盛，附近都闻到浓郁的

桂花香。广益小学的环境十分幽雅，但是，学校经费却较困难，除了陈家族众租谷约四十石外，还有一部分“太阴宫”（也在林店尾原广益小学对面现在已改建为县防疫站）的宫田谷，比起后来苔湖的承文小学的六百多石差得多了。据七十八岁老人郑芝鸿先生回忆：他是七岁就在广益读书的，那时学校里有四个班属于国民学校，教国文、算术，也教唱歌、体操、图画等课，还有一个班是私塾班，专门讲授四书五经。《瑞安县志》记载：民国四——六年学校纪事：广益：区立国民学校，四班，64人，教职工2人，岁入80余金。据郑士彬先生回忆：他在六十二年前在广益小学读书，先生批改大字作业时，圈一个红圈就让我们拿回家向妈妈调一个鸡蛋。

陈一善校长之后，继任校长的是陈觉民先生。这一时期是广益小学创办时期，各方面都很象一个样子。但是由于经费以及陈觉民校长离校出走，学校一度走向下坡，《瑞安县志》记载，广益小学曾一度停办，至民国二十二年恢复，二十五年有学生81人（其中女生27

人)，教师6人。据陈体滨先生回忆，1930年（民国十九年）他在广益读书，只有二个班，由陈达三先生执教。那时候，学校里没有时钟，陈先生在院子花圃中特意栽几株向日葵，用葵花的朝向作为上课、放学的讯号。这期间，王欣山先生，李伯琴先生也都曾在广益小学任教，那时仅有一位教师，事实上已和私塾无异，所以《瑞安县志》说它停办了。

以后继任的校长有陈益筹先生，陈友如先生。在1946年前后，学校的实际事务是由郑竹波先生和李伯琴先生管理的。1949年解放，第一任校长是王绍总同志，第二任是赵钦记同志。1950年与群益小学、承文小学合并为文成县立中心小学。

广益小学自创办至合并先后历时三十七年。时盛时衰，它和群益小学、承文小学一样，为大岙街的教育事业，作出了贡献。

明达学堂创办于清宣统二年正月。它是清文科举人林绍年创办的，校址设在现苔湖头文化宫。明达原是私塾，由于老师认真负责，教学质量好，致使外乡许多家长都把子弟送来

入学。《瑞安县志》第三期学校表（民国4——6年）记载：私立明达学校，编四级，71人，附设高等，编三级，42人。教职员5人，岁入165金。据八十四岁老人林守猷先生回忆：明达学堂初级四年，高级三年。他七岁入学，一直读到十四岁。他曾代表明达学校参加瑞安县学生观摩竞赛考试，当时群益小学派代表十一人；明达派代表九人。考试结果：群益小学得奖的一人；明达学校得奖的2人：林守猷先生和公阳叶涵先生二人得奖，此次观摩考试，成绩超过群益小学，名声大振。

继林绍年校长之后，林国辅、林达泉等先生都作过该校负责人并兼任教师。明达学校一直办到民国十六年（1927年）停办，先后历时十七年。学生都转到群益学堂学习，陈圣庆先生就是先在明达学校学习，后因停办而转到群益学习的。

与明达学校同时创办的，还有清武进士周胜祖创办的乐群小学和周遇滨创办的启明女子学校。但前者不久即停办，后者据刘伯超先生回忆，原办在苔湖后来并入群益学堂另

设一班女子班。由于原女子学校的学生，全已逝世，当时详细情况已难查清。

（根据林守猷、郑芝鸿、郑竹波、郑士彬、陈圣庆、陈体彬等先生回忆，参照《瑞安县志》由陈夫整理）

忆英大财专在中堡、龙川

诸葛平

一九四四年深秋，寂静的山村突然沸腾起来，人们奔走相告：大学堂搬到中堡来了！一时街头街尾出现许多大学生，他们白天在中堡对面程氏宗祠上课，夜晚住宿在民房里。这些大学生就是英士大学财政专修科的学生。

英士大学原创办于杭州，以陈立夫、陈果夫的叔父陈英士烈士取名，下设有法学院、工学院和行政、财政、会计三个专修科。由于杭州沦陷，随着国民党省政府的南撤，英士大学各院科也向南疏散。法学院迁泰顺司前，工学院迁泰顺百丈口（后改为北洋工学院），行政专修科迁永康方岩，会计专修科迁龙川花园地方，财政专修科则迁到中堡。不久，由于中堡祠堂太少，学生容纳不下，经与龙川乡政府商量，把原来龙川乡小学迁到溪对岸季宅祠堂，原校舍让出由英大财专迁入（即同春祠堂、娘娘宫、新祠堂三座相连之处，亦即今龙川中心

小学校址)。此后，龙川地方可够热闹：有大学、中学、小学，早、中、晚在街上、溪边、田间，处处可见学生。

英大财专是由当时财政厅厅长黄祖培兼主任，学校具体工作由李秘书（名记不清）负责，学制为两年，开设语文、日语、政治经济学、财政学、赋税、会计、统计等课程。除语文、日语和政治经济学由专职教师担任外，其余课程均由财政厅中的科、局长督察兼任。

学校的物质条件比较差。教师办公室设在同春祠堂，教室在娘娘宫，学生宿舍和厨房在新祠堂，还有一个小操场，安有一对蓝球架，有蓝球、排球，其他运动器具图书都没有。学生床铺以竹条代床板，隔间用篱笆做。用的是旧课桌，吃的是粗菜糙米，点的是蜡烛灯，穿着单薄。生活尽管艰苦些，学生学习还是勤奋的，清晨在溪边、山上朗读古文、唐诗，黄昏在烛光下看书、摘笔记。抗日胜利后，财专迁到杭州城隍山庙宇里学习，设备也很简陋，难怪后来有位同学说：我们这两年是同日寇为敌，和鬼神为邻，与书本为友。

英大财专规模很小，只有两个班级，学生一百多名，大多来自临海、黄岩、绍兴、东阳、义乌一带，生活全由公家供给。学生中文成人只有我一人，温州、瑞安、平阳也有一些。一九四五年秋毕业一个班，招进一个班，仍是两个班。一九四六年招一个班以后就停止招生了。

和财专同时迁到文成来的还有会计专修科。也是两个班，一百多名学生，教室在花园垵心王氏大祠堂，师生宿舍租住在民房内。抗日胜利前夕，一九四五年七月，财政、会计两个专修科先后随着省财政厅迁往云和河上，学习两个月又迁入杭州。

于1986.10.31

却话浙东三临中

赵祝炎

一九四一年残冬，在沉寂的龙川，一则令人振奋的新闻轰开了：“省里派督学钟士杰来村筹办中学，供沦陷区撤出的学生继续学习。”接着，街尾街头出现陌生的年轻人，而且人数与日俱增。据赵熙先生的侄子赵玉坡老人的回忆，钟督学从景宁来，原拟在徐村落脚，有鉴于徐村祠堂太少，才接受赵熙（国民党中央训练团上校政治教官）的建议，改择龙川。

龙川人宗族观念强，大小祠堂虽多，用来办学，要做好多思想工作。这个工作后来赵熙先生委托赵彦园先生帮助完成，厅里派来协助做地方工作之程德铨先生倒只负责料理师生生活与鸠工办料、制校具、修校舍等具体事务。经过半年筹备，省立浙东第三临时中学诞生了，九月下旬正式上课。出人意料，第一任校长不是钟督学，而是温州中学教务主任

陈骁先生。

学校规模不大，高中六个班，初中六个班，都分春秋两季。学生五百上下，大多来自绍兴、诸暨，生活全由公家包下来，当时叫“救济生”。学生中文成人没几个，高春三（第二届）有林希广、周国栋等三先生，高春一（第四届）有程秉庐先生。一九四三年春季，开始招收自费生（第六届），我县赵炳文、林凯二先生就是这时考入高中，赵冠东先生就是这时考入初中的。此后，浙南各县学生才逐年增多。

物质条件很差，校长办公室与各处室在象贤祠（现为大岙区农机厂木工车间），伙房在猪头片祠堂（现已为民房和公路），象贤祠左邻二房祠堂，猪头片祠堂左旁一字儿排开的积善祠（现拆建供销社）、六份祠（现为农机厂金工车间）当各班教室，学校还给上列祠堂起了个“官”名，分别叫“校部”、“膳厅”、“智斋”、“仁斋”、“勇斋”。校医室和女生宿舍在七份祠，男生宿舍在外房祠堂、上文昌阁（已拆）。运动场则租用大垞步头农田，可辟100米跑道，可设置两个蓝球场。

一个沙坑，一付双杠、一付单杠。至于理化仪器，则更可怜，只有音叉、弹簧秤一类“起马货”。图书总数不过一千五百册。

教师待遇低。没有家庭负担的，以口养身，马马虎虎；有家室之累的，免不了愁吃愁穿。朱培生先生头两年在龙川，人们老是看他穿一件旧的黑甲克，换不下洗。学生呢，更不用说了。解放后，曾在浙东三临中任教过的刘叔杨先生在泰顺中学工作，给我念过一付对联，据说是浙东三临中一个学生之作。上联是：

“清晨豆盐浅盏，薄粥盈瓯，中晚糙米半斤，南瓜数块；”下联云：“长夏团扇随身，草鞋系足，秋冬旧衣两袭，破被一条。”横批曰：

“抗日时期。”不仅如实地反映了当时大部分学生的生活实况，也充分表现出他们的思想境界，抗日时期吗，苦算什么？

一部分教师来自绍兴、诸暨一带，大部分是陈骁校长聘自温州，很多是底子雄厚，经验丰富的，如赵帮伟、方持衡、陈雁迅、游任逵、王季思、朱培生、林炜然、胡琴伯等先生在学生中都很有威望。文成籍的教师先后在这里工

作过的有朱国庆、周志燧、陈权、林本等先生。尽管物质条件差，生活清苦，教师们工作还是积极的。王季思先生一家住在一间抬头见瓦片、开步要防跌的民房楼上，过着常有断酒之危的日子，不但担了两班国文课和不时给学生开文学讲座，还利用假期去六十里外的温师讲学呢！大部分学生也是勤奋的。清晨，田野上、大溪边，但闻书声琅琅；黄昏，三“斋”里、“公馆”中（部份学生自己租民房戏称公馆），惟见灯火荧荧。直到现在，老人们还常以此为例，教育贪玩的小孙孙。

龙川民性强悍，殴击过国民党三十三师萧冀勉的勤务兵，打死过瑞安县第三中队赵龙文的士兵，可与浙东三临中师生却相处很好。方持衡先生清癯微须，貌似龙川人赵一祥，龙川人尊呼为“一祥公”。朱培生先生家庭困难，龙川人送瓜送菜。过年过节，龙川人常给租住自家的客人送点吃的，让他分享节日的快乐。甚至还有两家挑中了外路学生作女婿呢！师生也颇能联系群众。一九四五年秋，村民赵三友的妻子临产，盆骨不开，胎死腹中，校

医陈志洪先生夫妇急他人之急，苦战了四个小时，才把死胎取下，保全了产妇的生命。正是这份珍贵的情谊，使龙川人民至今怀念三临中，也惹得许多当年的老师和学生忘记不了龙川。解放初，我在革大学习，遇到当年在三临中任教过的鲍心荃、俞月华等先生，无不详细询问龙川近况。一九八五年十二月，曾在三临中毕业，当过宁波市委宣传部长、现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协宁波市分会副会长陈天章先生，专程来龙川访问三临中旧迹，并拜望老房东赵宪铎。

浙东三临中的教学质量不比兄弟学校差，及格率、优秀率以及升学率等由于找不到原始资料，无法提出具体数据；而一九四四年在第八区（即温州专区）运动会上的表现，则是我所目睹的。三临中运动队只有赵宜庭、许逢泰、武树锦等十八人，可在赛场上，观众只看到白背心、红裤头在纵横驰骋，耀武扬威。结果，田径团体冠军和多数单项冠军被他们夺走。这还不稀罕，稀罕的是运动员的文明礼貌和拼搏精神，获得大会工作人员与观众的好

评。200米复赛，三临中一名颇有希望的运动员被邻道的温中运动员越线踩了一脚，这是有意伤害对方的主力给本队主力开路事故，连观众都为之议论纷纷，而三临中教练、运动员冷静地听候裁判的裁决，没有一句不文明的话，一个不文明的举动。三临中那位运动员拖着流血脚，还坚持跑到终点。为此，大会兼会长张宝琛在闭幕式上特别表扬了浙东三临中运动员的高尚风格，奖给特制的锦旗。

当然，浙东三临中取得任何成绩，与陈骁校长的领导分不开。但美中不足，陈骁先生没有做好团结沦陷区出来的教师的工作，以致赵邦伟、方持衡、朱培生等先生先后离校；对沦陷区出来的学生也关怀不够，对自己的亲友照顾多了一点，以致一九四三年——四四年两次发生个别学生对学校领导的不礼貌的小事故。如果陈骁校长当年能克服上述缺点，可能有更大的成就。

一九四五年八月，省教育厅命令温师与三临中两位校长对调。说来好笑，两位校长对调，竟引起两校教职员大对流。原温师校长王德

懋接任三临中校长时，留任的只有军训教官林鹤鸣和会计张光粹，不久，日本无条件投降了，师生们欢庆之余，就预感到这所临时中学即将完成它的历史使命了。四六年一月，教育厅果真决定把三临中并入温中。自此，原三临中的高中部各班学生去温州入学，龙川只留下六个初中班的温中分部，分部主任为原三临中训育主任朱培生。下半年，王德懋先生调去绍兴中学，分部职员大多去了绍兴，新分部主任曾博孚先生带了新班底来替补。

要说胜利后三临中有可贵的变化的话，那就是在新形势推动下，关心祖国前途，关心时事政治的空气浓起来了。包惠康、王逸品等先生经常在会后课余揭露国民党破坏和平的阴谋，抨击国民党专制独裁，投靠美帝的罪行，学生会也请包先生为高中学生开时事讲座，记得讲题是“中国将往何处去？”，那个当过江西反省院训育主任的校长也只好置之不问。还有一点值得一提的是教职员工托胜利之福，工资有所提高，我的工资在全校来说还属于下上的，月入也有16100元（法

币)，时猪肉市价95元一斤。可惜好景不长，到四六年下半年，实际收入水平又急剧下降了。一九四七年一月，温中分部也撤销了。龙川送走最后一批客人，又恢复它原来的沉寂了。

联高在南田

抗战开始不久，杭嘉湖相继失守，许多中学被迫内迁至丽水碧湖。1938年6月，原杭高、杭初、杭女中、杭师、杭州民实中学、嘉兴中学、湖州中学等七校合并组成“浙江省立临时联合中学”，分高中部、初中部和师范部。高中部主任兼校务委员会主任为嘉兴中学校长张^印通；师范部主任徐旭东；初中部主任为唐世芳。教职员多为七校原有人员。共112人。三部学生共分28班，计964人。1939年8月1日，“联中”复分为临时联合高中、临时联合师范和临时联合初中三校，各自独立，校长由三部主任分任。1942年5月，联合高中（以下简称联高）迁双港，6月，迁云和沈村，续迁景宁，7月，复迁青田南田，即今我县南田镇。

联高在南田三年多，1945年10月，由南田迁往青田水南，年底搬回杭州。我们就联高

在南田这段期间，先后考入该校学习的。

联高迁到南田后，校长已由崔东伯先生担任。崔校长治学严谨、工作认真负责、作风民主、生活俭朴，备受师生们的尊敬。王大章同学回忆，他的入校考试口试就是崔校长亲自主考的，崔校长穿着一件已脱光毛的铁路呢大衣、看去象麻袋做的一样，但态度和蔼，娓娓谈来，好象不是在考试而是叙述家常，让人非常亲切。事后有人告诉大章说这人是校长，真叫人不相信。周日懋同学回忆：当时的学校经费全是由青田县负责支出的，县长翁圣木颇为卖力，得到师生们的好感。原来他想把一个女儿插入联高来学习，这种事，本来崔校长完全可以作决定的，但是他却慎重地把它提到校务会上讨论，并征询了学生会同学们的意见。他对待同学们是既严格又慈祥。陈夫同学回忆，迁往水南后，因为水土不合又发了疟疾，不能上课，崔校长曾来住处（租住老百姓家）探望。学期结束时，对那些不能去杭州学习的同学，还亲笔写了条幅赠送。当时我们的饭厅就在刘基庙大殿，八个人一桌，没有

凳子，都站着吃的。有一次晚餐，分菜的值日同学把刘荫同学的菜分漏了。刘荫一进饭厅，找不到自己的菜，他就大声高呼：“哪一个监厨，哪一个监厨？”（当时的伙食是由学生自己管理的，每天轮流分菜监厨）刚好崔校长走过来，他就走到讲台上对大家说“分漏了菜是值日同学工作的疏忽，但这位同学却在饭厅里大声呼喊：‘哪一个，哪一个’，多么没有礼貌……”这件事给我们的教育很大。

在联高的学习生活期间，大家一致感到下面几点体会都是很深刻的：

一、优良的学风：同学们对学习都十分自觉认真的，平时大家谈的做的，无不与学习有关，学校里十分自然地笼罩着一种学习研究的气氛，同学们把全部精力都放在学习上，很少发生象吵架等违反纪律的事。当时由于印刷困难，没有正式课本，有的课用的是一种极粗糙低劣象马粪纸那样的讲义，更多的课是靠摘笔记的。因此课余时还要整理校对笔记。天蒙蒙亮，田野、山坡到处是同学们在背诵课文。星期天大家也都坐在教室里做功

课，尽管没有老师，却也和平时上课差不多。

二、简朴的生活作风：联高的师生们生活是很艰苦的，老师们的工资尚不能按时发给，他们穿的都很破旧。有这样一回事：还在丽水碧湖时，一个新入学的学生，把教几何的卢叔华老师当作工友，（卢老师那套服装确实十分破烂，加上他不修边幅，更显得寒伧。）叫他去买花生米。后来在水南，学校为这位卢老师六十岁做寿，送给他一件长袍。

同学们的伙食是自办的，小菜大多是青菜萝卜，有时还用蕃茹作小菜，一个星期里难得吃上一两片肉，就算是改善生活了。吃饭是限时间的，由值日同学喊口令：“立正、稍息、开动！”只听到一片咀嚼声，再也没有别的声音了。时间一到，饭桶即抬走。早上稀饭，又稀又烫，新来的小同学，还吃不到半碗，时间就到了。开始那一段时间，他们都是饿肚子的。后来渐渐学会一套办法，那就是第一碗盛满，第二碗少盛，第三碗拼命盛满。晚上自修用的是青油灯，灯盏放在一个竹筒上，四根灯芯交叉成十字，四个不同的方向同时点着四盏灯，可

以供四个同学同时学习。

三、老师水平高：联高的教师有许多原是大学里的教授，因为不愿去内地而来联高任教的，他们本身学问好，教学经验丰富，加以认真负责，因此，教学效果好。如崔东伯校长、沈儒全老师、王冥鸿老师、徐造华老师、钱南扬老师、丁公达老师、王新吾老师、赵邦伟老师，后来都成为名教授。教学方法也很灵活，如高一自然地理课，老师把学生带到野外小溪坑，观察沙洲产生过程来解释讲解冲积平原的形成。这样的活知识，印象深刻，长久难忘。陈夫同学回忆：他在联高做的历史笔记，后来转学到瑞高时，即被作为历史教材。

四、图书多仪器设备好：尽管学校东搬西迁，携带不方便，但是图书和仪器却仍不少。在南田时，校内还有二名图书管理员。上生物课时，每两个同学可以分到一架显微镜，上军训课时，每人可以用一支步枪。其他物理化学的仪器也很多。

基于上述原因，联高也和原杭高一样，每届毕业生都有十多名直接选送入全国名牌大

学。联高在南田的45届毕业生就有十二人直接保送上大学，其中南田的刘久持同学就是第十名，他被保送厦门大学，后因厦门大学太远，改入浙江大学学习。

五、师生之间感情融洽：在联高师生之间的关系很融洽，平时，同学们常常一批一批到老师寝室玩，问些问题也谈家常，老师们还经常与学生一起散步闲谈，互相建立起深厚的感情，记得学期结束时，老师们都要回杭州了，我们文成籍的同学们自动凑了些钱，买些日用品（如肥皂之类东西）送给老师们。

联高在南田时，共有九个班级，秋季一、二、三年级各两个班，计六个班，春季一、二、三年级各一个班，计三个班，分别在南田村刘基庙附近的祠堂里上课。三百多男女同学一律寄宿在学校。膳厅即在刘基庙大殿。在学习之余，同学们自己组织各种课外活动，如各种读书会，文体小组。刘久持同学就是那时参加“古欢社”学会拉胡琴的。由于学校领导作风民主，同学们对时事也很关心，经常刊出墙报，并利用暑假在南田演

出曹禺剧作《雷雨》《日出》，进行抗日救国宣传。

1945年9月，学校在南田牌坊坦搭台，与当地群众共同庆祝抗日胜利大会。师生们为结束流浪生活学校即将搬回杭州而欢欣若狂。不久，忽传平阳大刀会作乱，有可能向南田一带侵扰，一时间人心惶惶，先是，学校得到乡公所通知，如有大刀会来，鸣枪为号，同学们分散往青田方向逃跑。果然有一天夜里听到了枪声，大家慌里慌张地逃出来了。大岙的同学们即往二源新东这一方向逃回家。后来才知道，大刀会根本没有来，是乡公所的一名乡丁擦枪走火，引起了一场虚惊。经过此次扰乱，学校决定迁往青田水南。

联高自1942年8月迁来南田至1945年10月迁往青田，先后三年，共招生九个班，其中大岙、南田、黄坦、玉壶等地即现文成县的同学有数十人。她与当时迁来的三临中、英士大学、温中分部等学校一样，给文成县山区原来没有条件入学的青年以学习的机会，为文成县培养人才出了力。四十年过去了，目前，联

高的校友正在各条战线上工作，大家想起在联高的学习生活，无不感到十分幸福。

联高校友：周口懋、刘久持、刘际松、王太章、陈夫（执笔）

忆温中分部在三滩

刘 际 松

一九四四年夏，抗日战争进入战略反攻阶段，日寇作垂死挣扎，疯狂侵占我浙南各地，温州、青田相继沦陷。温州中学本部从道司前迁往泰顺莒江，青田水南温中分部迁到南田三滩。

南田，当时属青田县的一个区，並有青田“米仓”之称。虽然地处高山，交通闭塞，抗战时期的南田，却成为安全的大后方。一九四二年省立联高、省图书馆、福音医院（在金华）相继迁到南田，省高等法院、省税务局，迁到南田鹤岸村。在当时省级单位林立南田的情况下，距南田不到五华里的三滩，又因民房集中，庙宇、祠堂宽敞，村前小溪用水方便，就自然成为温中分部搬迁的校址了。而当时的三滩，是只有廿一座民房，住着六十来户、三百左右人口的村庄。温中分部六个班，

师生员工也近三百人。教室全部利用庙宇、祠堂和民房。村尾的地主殿是个四合院，正厅和两厢修理成三个教室，殿门的几间作厨房和炊事人员宿舍。殿后的恒二公祠安排一个教室，一个教师休息室，一个男生寝室。还有两个教室租用附近一座民房（刘开亮同志家）。这三座房子也就成了当时温中分部的中心。师生宿舍布满全村每一座民房，没有膳厅，也没有办公室，全校学生会议，用地主殿小天井作礼堂。我家五间两厢老屋，原已住有五户、廿六人，学校还租用楼上正厅作女生寝室，楼下做音乐教室，两厢还住上五个教职员，十多个男学生。全村每座民房都同样挤得饱饱的。连溪边的草坪也被辟为运动场了。

温中分部在三滩，虽处于战乱时期，办学条件差，但课程开设是齐全的，教师教学认真，教学秩序稳定。原分部主任李光远老师未上南田，温中校长朱一青都在泰顺莒江，偶时来到三滩，也未住上两天就走了。三滩分部由黄祥泐主任负责，他毕业于之江大学，也是我们毕业班的数学老师，《三S半面几何》教得非常

好。语文教师姚毓璆是我的班主任，青田人（现在杭州园林管理局任工程师）。他知识渊博，兼教生物，当时就著有《生物的趣味》一书。那时没有语文课本，他选教的古诗词名篇和刘基的《卖柑者言》，至今还记忆犹新。历史课是联高教师丁公达来兼课的，他对历史很有研究，当时著有《投考大学丛书历史之部》。训育员蒋友贵，是校长朱一青的亲信，许多教师对他敬而远之，是当时温中分部的实权人物，我们三年级的同学都很清楚。给同学们印象最深的是陈孚恒老师，绍兴人，毕业于中山大学，兼教我们的英语、物理、化学。他教学非常认真，有一次，为了校对自己的英语语音，他带着我特地去南田寻找美国军人谈话，（当时，南田不时有中美合作所过境的美国军人），通过十来分钟的对话，认为自己语音正确无误，就鼓励我们，叫我们放心学习他的英语。当我们临近毕业的时候，他还深夜刻印蜡纸，印发给我们英语单词、语法、会话、问答四厚本英语资料，当时他已年过四十尚无眷属。同时，由于当时通货膨胀，货币贬

值，为维持生活，曾变卖了毛线衣。他为人正直，审时度世，长叹世态炎凉，受人欺压。有一次，他给我们上英语课，在抒发课文《中山狼》时，泣不成声，离开了课堂。他在苦闷之余，就精心喂养着他最心爱的两只母鸡，并谑称为“白小姐”、“花小姐”。他同情山乡农民的贫困生活，他漫骂，骂豺狼当道，民不聊生；他怨恨，恨农民无文化，不讲卫生、不懂科学，是永世离不开乡土的“棺材”，是尚未开化的“老苗”。陈孚恒老师的叹、骂、恨，是对黑暗的旧社会的控诉，也可能为了激励中国农民的早日觉醒，盼望中华早日腾飞吧！

温中分部在三滩只一年时间（一九四四年九月至一九四五年九月），时间不长，却起了文化播种作用。回忆那时的学校情景，生活是艰苦的，学习是紧张的。那时南田还没有电灯，晚上同学们自修点着煤油灯，上课无课本（有时老师发点讲义），都是老师讲同学们摘笔记，摘得非常紧张。冬季，天还是摸黑，司号员就在村尾的石板桥上吹起了响亮的号角。朱自

清先生作的校歌：“雁山云影，瓯海潮淙，看
钟灵毓秀，桃李葱茏，怀籀亭边勤教诵……”
鼓励着同学们勤奋学习。一九四五年八月，
抗战胜利，九月，温中分部也迁回温州道司前
本部去了。

忆瑞安西区小学生运动会

赵超植

一九四一年（民国卅年）九月，在大岙镇举行一次西区小学生运动会。这是文成建县前唯一的一次运动会，距今已四十多年了。我当时正在龙川乡中心小学任教，亲历其境，记忆犹新，惜乎原始档案材料已无法查考，只能凭个人记忆，记述于后。

那时，大岙是瑞安县的一个区，因位于县城西部，故名西区。各乡普遍设有中心小学。此次运动会的参加者都是在校的学生，其规模之大，项目之多，都为前所未有。大会会长由当时的大岙区区长黄永言兼任。黄永言是知识分子，也许是一时兴致所至，偶一为之，因此以后再没有第二次了。

参加运动会的运动员约三百多人，按身材高低分为甲、乙、丙三个组。在田径项目中，还列入当时罕见的掷部：标枪、铁饼和铅球。

这些器具都是自制的。同时，还有男女篮球赛。叠罗汉、哑铃操等集体表演。大会特请瑞安中学体育教师泮大年担任总裁判。运动会在今县体育场当时还是刚平整准备开田的平坦上举行。时值秋天，天高气爽，运动场上搭起高高的司令台，黄永言区长和总裁判等人坐在司令台上。每一项比赛开始，都由裁判长立正报告，气派十足。家长们也都高兴地为自己参加运动会的子弟做了统一的运动服，为运动会增光生色，场面十分壮观。为期二天的运动会，吸引了四面八方的很多观众。

运动员们表现得十分出色，特别是承文小学的叠罗汉，上下四层，动作迅速、优美、惊险。大岗区小学（即群益小学）的的哑铃操，动作整齐、节奏轻快和谐。都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博得大家的赞许。有几个运动员的成绩，十分突出，一时间成为“出名人物”，使我至今尚记得。他们是承文小学的陈建琴同学，她一人获得女子长短跑二项冠军。承文小学的陈圣构同学的成绩也很好，是男子冠军。还有泉台小学的陈碎娟同学，也获得女子长

跑冠军，他们三人不仅跑得快，跳高跳远的成绩也好。原来陈碎娟同学家住在离校数里的山上，每天上学放学都跑步上下一条山岭，长期的锻炼，成为飞毛腿。现在这些同学也都是五十开外的人了。她们的事迹都留在人们的记忆之中。

运动会比赛结果，承文小学得团体冠军，大岙区中心小学得亚军，泉台小学获第三名。分别授予银盾、锦旗，其他学校也得到部分奖励。

1986年9月6日

名噪一时的飓风篮球队

赵超植

飓风篮球队是我县最早一支群众性的业余篮球队，曾是一九四二年第八区（温州市）运动会篮球赛的冠军，又是次年专区发起的“胜利杯”获得者。后来，附近几个知名球队都找他们作友谊赛，结果无一不是他们的手下败将，由此，名噪一时。至今一些老年人还津津有味地谈论着当年耳闻目睹的盛况。

一九四一年航空飞行员郑明恕因体质条件不适应而退伍回乡，应聘于承文小学任体育教师。校长陈圣庆也是个篮球爱好者，于是共同发起组织了“风飓篮球队”。球队成员来自社会上的不同岗位，他们利用业余时间，进行艰苦训练与探索，球艺与日俱增，很快成为名震遐迩的篮球队。当时球队的主要骨干，现在健在的除陈圣庆外，还有郑明恕、吴信钧、陈体椿、林希广、蔡远等人。号称“铁门

问”的陈子万已不在人世了。

飓风队成立以后，一九四二年瑞安'县篮球赛时，已崭露头角，于是作为瑞安县代表队参加第八区运动会篮球赛。那时候共有三十二队分别代表各县机关、学校、社会团体及驻军参加比赛。群雄角逐争强，盛况空前。其中永嘉队素负盛名。时温州未设市属永嘉县辖，永嘉队即温州队。他们唯恐实力不足，把非温州籍的杭州知名球手号称大力士的胡长海（探亲在温）也特邀来了，受到舆论非议。最后飓风队与温州队作决定性较量，获得冠军。当时温州人对“山头人”得冠军很不服气。四三年春，在专署的主持下，发起“胜利杯”篮球赛。温州球坛即组织一支“友联”队把几个当地篮球高手都拉到“友联”队。经过一场激烈球战，“胜利杯”又乖乖地落在“飓风”之手。这一场比赛，表现了“飓风”的非凡球艺，观众人山人海，皆慕名一睹为快，每次得分，欢声雷动，掌声不绝于耳，热闹之极；越一年（四四年），省警大队随省府部分机关进驻文成，当年省警就有一个专业性的球队。他

们根据长官意旨，经常腾出工作时间，练习球技，是专门用来应付球赛、争荣誉的。飓风队的陈圣庆就是因为球艺可取，被邀请到省警工作的，在此前省警一连几年连挫省城有名的交通队和浙盐队，连续保持省级篮球冠军。他们一到文成，听说山区有这么一支出名的球队，感到惊奇，皆跃跃欲试，定要比个高低，先后交锋两次。第一次负于飓风队，这是出于他们意料之外的。省警领导因此大发雷霆、捶拳击桌。大骂球员是“混蛋”“饭桶”。第二次比赛时、便作了充分准备，而且不顾比赛规则，横冲直撞，每每出现犯规现象。“飓风队”眼看情势不妙，大家心领神会地却步不前，结果输了“四”分，负于省警，但实质上的胜负，明眼人心中自有个底数。

四五年抗战胜利，飓风队多数球员星散在外地工作，球队无形解散，但对我县的篮球运动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那以后，业余篮球队如雨后春笋般地不断涌现。在大岙镇就有“海燕队”“山雨队”“栖中队”“朝霞队”“飞燕队”等。在校学生大多也各有自己的球队。

各小学普遍设置篮球场，把打篮球作为学生课外活动不可缺少的项目。由于小学基础好，升到初、高中，不少成为所在校的篮球校选，篮球风可谓盛极一时。解放后，由于党和人民政府重视体育运动，这种球风更蓬勃发展推向了新的高潮。

（资料来源：飓风篮球队的陈圣庆、郑明恕，吴信钧提供。）

一九八六年三月一日

抗日战争时期南田学生运动

刘久持

(一) 爱国主义思想在少年学生的心中深深扎根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芦沟桥的炮声揭开了抗日战争的序幕。在全国人民要求抗日的呼声中，第二次国共合作达成协议。一支在粟裕同志主持下培训出来的青年学生宣传队从平阳三门奔赴浙南各地进行抗日救国宣传。

一九三八年春，以张梦龄为组长的十多名乡政指导员来到南田。他们到达南田后，便去找当时在南田小学旁底园祠堂补习的二十多名少年学生。清早教他们学唱《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流亡进行曲》等革命歌曲；课后教他们编排《放下你的鞭子》、《八百孤军守仓库》、《打倒卖国贼袁世凯》等剧本。并吸收当时从外地回乡的中学生一起组织成立了南田少年团。推选刘广

年和刘溢名为正副团长。抗日救国的爱国主义思想在这批少年学生的心中深深地扎下了根。他们走出课堂，和乡政指导员们一起下乡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动员广大青年踊跃参军、保卫国家。“好铁要打钉，好男要当兵；杀退日本鬼，才能有和平。”大家出墙报，及时报导前线胜利消息和广大群众抗日救国的活动情况。还举办民校向群众讲抗日救国的重大意义。可惜不到半年，第二次国共合作破裂，乡政指导员们被迫撤离南田。但南田少年团的学生们却仍坚持宣传工作，并组织大家进行军事演习，白天学习射击打靶，黑夜训练野营袭击。直至一九三九年春，大家考入温中、处中、安定中学等学校后，才暂时中止活动。

（二）一场迫害与反迫害的斗争

一九四〇年夏天，从各学校回乡度暑假的少年团员们又集中起来进行活动：出墙报、办民校。

八月四日中午，他们带着慰问信与慰问品到离南田五里路外的龙上村去慰问从沦陷区嵊县流亡出来的“高升剧团”。剧团负责

人感激得热泪盈眶说：“你们学生太好了！但我们这次到南田，却遭到国民党南田区公所警察的敲杠和勒索……。”学生们听了十分气愤。返回南田时，立即闯入区公所，要求区长张兆南查明事实，严惩当事者。适值区长外出不在，口吃的区案（秘书）支支吾吾地说：“没没有这样的事情，如如果有人证，一一定打屁屁股示众。”麻脸的巡官急得瞪大了两眼，不知如何是好。

第二天，高升剧团到南田演出，戏台就搭在区公所的大门口前面。下午演出前，学生代表刘广增、刘务升上台向群众揭发了南田区公所警察向高升剧团敲诈勒索的事实经过情况并要求观众代为找到人证，以便晚上警察打屁屁股示众。话声刚落，“抗日救国”、“打倒贪官污吏”的口号从台下四面八方响起，群众情绪极为高张。

谁知晚上，戏台柱上贴着一张乡政府“禁止晚上演戏”的布告。区公所的大门紧闭着，一支支枪口对准门外的广场。警察们吃饱了一肚子酒肉，横下一条心要向学生们下毒

手。学生们得到消息后，大家聚集在民校办公室（即现南田中学厨房）商量对策；来观看警察打屁股的群众从各方涌向区公所门口的广场，大家看到布告，十分愤怒，有的去找乡长讲道理。哪些等得不耐烦的群众把一块块石头抛向区公所的大门。人群越聚越多，石块越抛越密，警察们的心也更加狠毒，当他们看到广场上有位穿白色上衣的人出现时，就误认为是穿白衬衫黄短裤的学生出来活动了，立刻一齐向广场射击。当场打死群众二人，打伤三人。枪声和死人激怒了群众，大家冲进区公所，砸烂了区公所里的一切东西，警察们突围的突围，爬墙的爬墙，星夜逃向青田县城。这就是南田人民所称的“八五惨案”。当时国民党的《东南日报》上刊登的消息，却说是“南田学生暴动”。

十天后，青田县长以定邦带领一支县自卫队前来南田，与当地土豪劣绅们经过精心策划即向南田学生布下了罗网，先逮捕一些学生，然后强迫家长拿出钱来抚恤死难群众的家属。就这样平息了八月五日这场风波。

八月十五日下午三时，学生何毓槐从南田小学油印民校课本回民校办公室路过区公所门口时，即遭逮捕，缺乏斗争经验的学生们立即从民校办公室涌向区公所，要求与县长评理，可是区公所大门岗哨森严，不让大家进去。大家不吃晚饭坚持斗争。九时许，县长以派代表进去谈判为名，又逮捕了学生代表林成槐。大家更加气愤，在区公所门外，用唱歌来坚持斗争，歌声一直不断。到十二时，老奸巨猾的县长又施展诡计，亲自出来对学生们说：“我是一县的父母官，你们要听我的话。我们与林、何二人的谈话还未结束，保证明天早上给你们接回去。如果不听，坚持胡闹，即作共产党闹事处理。”学生们信以为真，就一一回家。第二天学生们再来区公所时，有人告诉他们说，林、何二人早两个小时就戴上手扣脚镣被押到青田县城去了。这就是南田的“八一五事件”。

年轻的南田学生从斗争中经受了锻炼，吸取了教训。他们不气馁不退缩，立即分赴西坑、敖里、黄坦等地，进一步团结全区的中

学生和家 长继续跟国民党官吏作斗争；他们请律师通过合法的形式向法院告状；他们组织和发动在青由水南的温州中学高中学生，向青田县政府请愿、抗议，迫使青田县长不得不释放林、何二同学。双方在处州中级法院第一次辩论斗争时，学生们的正气凛然，正义的声音终于压倒了一批镇压人民的刽子手和贪官污吏，使他们在法庭上理屈辞穷，狼狈不堪；第二次会审时，对方就不敢出席了。结果是被诬告的二十一名学生，没有一个被开除学籍。而县长以定邦却调离青田，区长和巡官被撤职。南田学生的反迫害斗争胜利了。

（三）扩大队伍，继续斗争

一九四一年暑假，各校学生再次集中家乡，大家回顾了“八五惨案”和“八一五事件”，一致认为南田少年团的组织已不相称。为了适应新的形势，决定改名为“八一五同学会”，推选刘广增为会长，领导同学们继续斗争。一九四二年六月，日寇大举入侵金华，丽水和温州。省立联合高级中学从碧湖迁来南田；温中分部迁南田三滩，同时迁来本县附近

的学校，还有龙川的第三临时中学，泰顺莒江的温州师范、泰顺百丈口的英士大学（其中部份在龙川、花园）。学生的人数骤然猛增。为了适应这一新情况，必须扩大队伍，增强力量。一九四三年八月，又把“八一五同学会”改组为“南田通讯社”。到会的学生达八十多人。会上推选张明扬、刘广增为正副社长，并以联高南田学生为核心组成干事会，主持日常事务。定期出版《南田通讯》，以团结各校学生与恶势力进行斗争。《南田通讯》先后出了六期。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寇投降，抗日战争取得了最后胜利，各校纷纷迁返原地。南田在各校的学生因地区过于分散，联系困难，“南田通讯社”的组织也就无形中解散。

文成县诞生·回忆鳞爪

刘兆祥

追溯既往，早在民国廿五年前（一九三六年），乡里有识之士，曾倡议在南田区实宜另行成立县治之说。自民国廿六年七七抗战军兴，全民一致急于御敌，即未遑论及矣。

民国廿九年（一九四〇年）余由重庆奉派东南服务，先驻宁波（管辖沿海各县市特勤任务），至民国卅年夏月宁绍失守，奉命转驻金华，并强化组织任务，（管辖浙江、皖南、闽北地区）其时省政府（主席黄绍竑）、省党部（主委谷正纲）已在永康县方岩办公，作为临时省会，黄主席公馆则移居金华北郊罗店，省军管区司令部、省保安司令部（皆主席兼司令）、保安处（处长宣铁吾兼副司令）、青年团、省邮政管理局、省电话局、省银行、东南日报、以及中央、军委会所属之单位，如军风纪考察团、交通运输、检查管制单位，皆分散在金华城内办公。在民国卅一年（一九四二年）农历腊月，宣铁吾处长邀约叙餐（实为农历过年吃年夜饭），有中央、军委会所属各单

位主管，及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赵龙文、社会处处长方青儒、省府秘书郭雁翎、参谋长李秀等人在座，余即向宣处长建议：“青田县属之南田区八、九都及瑞安、泰顺、景宁边界，地方不靖，因距离县城太远，政令推行、治安维护，有鞭长莫及之感。可否以南田为中心，将邻县部分地区划并为行政区，另行设立县治……”宣处长已瞭悉当地情况，当即表示赞同。越时半月，适逢农历春节，余即邀约方青儒、郭雁翎两兄（现均在台湾）陪同往罗店，向黄主席拜年。因余之职务属军委会，黄主席以宾客礼遇接待，当时秘书长李立民亦在座，余即将南田区八、九都形势、地理环境、以及邻县边境治安状况，提出简报，建议以南田为中心区，将邻县部分乡村规划为行政区。为纪念明开国元勋（刘伯温文成公）勋业，请命名为文成县。黄主席表示原则同意。迨至民国卅二年（一九四三年）五月间，敌寇调集四个师团兵力，以衢州为目标，分三路进犯金、衢、严地区，金华风云危急，余奉命转进龙泉，省党部、省政府先迁丽水，以后

再迁移云和为临时省会，（东南日报迁移福建建阳），缉私处、电话局迁往碧湖，教育厅迁往景宁，军管区司令部、省银行、盐务总局、邮政管理局、青年团、及部分中央所属机构皆迁龙泉。余在龙泉时期，曾先后与重庆族兄刘劲持多次通讯，向他报告，为南田地区成立新县治进行经过情形。并承指示：“务希积极进行，早日成立，以文成、伯温、诚意三者选择其一为县名，以纪念先祖文成公，县政府设在南田为宜……”等语（注）。是年秋月，南田乡长族侄刘德隅专程来访，留宿一周，秉烛长谈家乡事及地方治安情形，因余事先已决定赴各县视察业务，即偕同德隅先抵云和，往见黄主席，当时省府秘书李浩亦在座（现在台湾），余再向黄主席建议：“为了南田地区老百姓生命财产安全，请尽速在南田地区成立新县治，并以南田为中心，以瑞、泰、景边境部份乡村为外围，规划为行政区。”德隅亦从旁强调补充说明，黄主席当即表示“希即补送资料，以凭办理。”辞出后，由云和经松阳、碧湖、丽水直抵青田县

城，邀约邢弼（当时任青田县党部常委）往见县长翁桧，因翁县长曾到过南田八、九都，对当地情形甚为熟悉，对余提议将在南田地区成立新县治之意，不谋而合，表示双手赞成。当即会同研商，并作初步决定，为纪念刘文成公勋业起见，命名为文成县。翁县长主张以水流为界限，水向小溪流入瓯江者，仍归属青田县。水向瑞安飞云江者归属文成县，文成县行政区其范围包括南田九都之南田、三滩、十源、三源、二源、篁庄各乡村，八都之梧溪、西坑、敖里、叶岸、西里、石庄、黄坦、雅梅、上垟、下垟各乡村，瑞安县属之大岙、龙川、玉壶、桃坑、淡洋、三门、高楼各乡村，景宁县属之邻接山区地带各村落，泰顺县属之百丈口地区，制成文成县行政区域草图，交由德隅先行带回南田磋商。余继续往各县市视察，经平阳、瑞安抵达南田故乡，其时浙江省高等法院、直接税局、省立图书馆、省立联合高中学校、温州中学，皆避居南田，余即分别往访当地长老、耆宿，族兄刘耀东、刘炳枢、张品纯、周石青、周献初诸先生交换意

见，获得一致赞同，但主张将万阜、岭下两乡仍列为文成县管辖区，同时余建议，请八、九都人士主动发起，派代表向省政府呈递请愿书，共策进行，以期达到目的（事后侧闻，有八、九都代表名义，向省政府呈递请愿书）。余经景宁、云和返回龙泉驻地，即撰写陈情书，重新绘制行政区域图，陈情书内容，大意为：“查青田县属南田区八、九都各乡村及瑞安县属之大岙、龙川、玉壶、淡洋、桃坑、高楼各乡村，泰顺县属之百丈口地区，资源丰富，人文荟萃，地区辽阔，唯距离县政府皆甚远，地方治安维护，政令推行，皆有鞭长莫及现象。近年来地方不靖，因此，建议以南田为中心，另行成立新县治，为了纪念明开国元勋刘伯温文成公起见，请命名为文成县，将县政府设在南田，使人民得以安居乐业，则地方幸甚，谨检附行政区域草图一份，恭请察核。”（引文系凭记忆，写稿无法调到档卷，故非原文照录，但文意无误。）等语，陈情书写就后，正拟派专人送云和，适黄主席亲临龙泉巡视，有傅杨诚等人随行，宿盐务总局招待所，余

即前往晋见，主席正在主持会议，散会后承蒙接见，黄主席阅过陈情书后、对余说：“我回去就交办好了……”辞退后再与傅杨城兄交谈，请傅兄从旁协助，以促其成。因傅与族兄刘劲持系同学，表示全力支持。约在民国卅三年春月间，青田县政府接奉省政府指令，准予筹备成立文成县，先派胡迪之为筹备处主任，胡因故久不到任，旋即改派陈志坚（湖南人，现在台湾）为筹备处主任，积极展开工作，省政府並派员会同陈志坚勘察县址及行政区域，侧闻会勘结果，认为南田地处高山之上，交通不便，冬季严寒不适，并将万阜、岭下两乡仍划归青田县管辖，选择大岙镇、黄坦两处为预定县址地，报省核示。迨至民国卅四年（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天皇广播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战胜利，举国欢欣，在普天同庆之时，余奉电调令调任上海特区服务，仍兼任原职，在此阶段，奔忙于浙、闽、皖、沪杭道上，备极艰辛，后以吾儿国章在沪病故，在精神上遭受重大打击，公私交迫，是故，对文成县筹组事，即未再过问矣。

民国卅五年（一九四六年）政府实行宪政，余奉调内政部警察总署服务，曾向内政部探询到浙江省政府已报请行政院（内政部主办），民国卅六年六月余又奉调江西省警保处人事室主任兼任保安司令部人事科长任内，曾见到国民政府公报（日期文号未记得）已公布浙江省成立文成县。同时直接间接据乡亲见告，在民国卅三年春月陈志坚任主委，秋月会同省政府专员勘察结果，决定在大岙、黄坦两地择其一报省核示。抗战胜利全国复员，省政府于民国卅五年（一九四六年）五月改组，黄主席卸任。由沈鸿烈继任主席，沈主席选派民政厅视察叶木青（瑞安人）为文成县第一任县长，并责由叶县长选择县址设立县政府，唯闻叶县长一介文弱书生，初到任时，对当地情形不熟悉，既未遍访各乡村，亦未到过南田？迳往黄坦，受到当地热烈欢迎（因叶与张準有师生关系，即寄居张家），并决定在黄坦设立县政府（又一说，在黄坦仍是为筹备工作），约半载，不知何故，又再迁移大岙镇，以迄于今，已四十载矣。

有关各级政府核准年、月、日、文号问题，调阅、查询档案难求，余于今年二月廿五日以私人名义函请内政部查询，日昨接奉内政部七十五年三月三十日七十五地司发字七〇九六号函复：“经查浙江省文成县于民国卅五年十二月由瑞安、泰顺、青田三县边区析置，县治大岙镇，以迄于今，无所变更。”此为唯一证明之公文书，不够周延，深以为憾。

余离乡背井，已长达四十余载。岁月蹉跎，现年八十有一岁，记忆、思考力均形退化，今栖迟海隅，手头又无第一手资料，仅就个人思索回忆，草成此文，言犹未尽，语焉不详，挂一漏万，实所难免？惟事关吾“文成县”历史文献，基于国家民族观念，乡土情感，道义之所寄，聊尽棉力而已，为求其真实、确切计，仍请各长老、乡亲、社会贤达，赐予斧正，不胜盼企之至。

中华民国七十五年四月二日于台北

注：据刘劲持先生回忆，县名之提议确有其事，至于县府设在南田，当时劲持先生也认为不妥，这里可能是兆祥先生记忆不确。

回忆碧湖起义前后

胡永孚口述 周志厚、胡克守整理

胡达新到广州

我原是在南京国民党陆军司令部当部员的。一九四七年一月，调到广州国民党陆军第九训练处当副组长，处长是陈沛，他后来当南京卫戍副司令。就当时的人“事关系”讲，我是属陈沛的人，正组长刘××，是白崇禧的人。刘仅是个挂名组长，实际上我代正组长。训练九处的摊子比较大，包括一个军，两个师，有一所两个团的干部学校，还有一个七八十人的美国顾问团。

当时，与我同班的赖绍峰和一个姓顾的，三人比较知心要好，常在一起商量事情，谈论时局的发展，彼此有共同的见解。我从国民党内部分部报上看到广东、福建、江西、浙江等省共产党与游击队活动情况，同时，目睹国民党内

部的腐败、互相勾心斗角的现实，对共产党产生了向往之心。

一天，我家乡文成玉壶的堂房兄弟胡达新突然来广州找我。对我说他在家乡参加了共产党，国民党正在追捕他。还说自己已脱离共产党了，但不出卖党组织，要求在我部下工作。我立即表示同意，将他留在我部。

当时，我从广州国民党的《人报》上看到浙江括苍山“匪情”——共产党活动频繁的消息，就问胡达新是否真实，他说是真的。还说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是生根在广大人民群众中，秘密发展组织，打游击。他就是以做道士为掩护替共产党工作的，他还讲自己认识当地的共产党负责人刘正发、张金发、朱大孝、朱玉发、周醉樵、周国华等人。还同他们一起干过革命工作。

我知道了一点浙江家乡共产党的活动情况后，萌发了先与当地共产党联系的念头。便与赖、顾一起商量，决定由赖绍峰去东江与曾兴地区共产党游击纵队负责人吕新泽联系，因赖是东江人，不久，就联系上了。但工作进展

得很缓慢，时间拖了很长。加以赖绍峰的胆子小，不能干更多的工作，便由我自己直接与吕联系了。

后来，训练处处长陈沛调到南京去，我也被调到军官学校当教官。我去军官学校之前，有一个叫钟彬的来广州当我的组长。从有关方面获悉：因我与东江共产党的联系，已引起钟彬等人的怀疑，才被调离的。不过，我还是若无其事地应付过去了。

我与东江共产党秘密联系的事，胡达新都知，也了解我的心思。听他介绍我中学时教三民主义的老师周醉樵和同班同学周国华都已在家乡参加了共产党。我想，在广州至多只能是一个人投向光明，不能带部队起义，要起义，冒险性是很大的。因此，我决定离开广州，回浙江来。

回到温州家乡

我在一九四八年八月离开广州，先到南京，经上海转温州。在南京时，碰到一个叫贾亦彬的人，他是原国民党预干局副局长（正局

长是蒋经国)，他下面有一个处长叫盛文山，与我在军校时是同学。我和贾是在盛的家里碰上的，在场的还有张灵甫（即七十四师师长）和张下属一个姓王的团长。那位王团长是在淮海战场上被解放军俘虏经教育后放回来的，当时在南京训练团里。我问王团长：“你在共产党那里怎么样？”他说：是共产党要他带着任务放回来的，这任务永远也难以完成。三人在盛家谈得很投机，谈论国民党内部矛盾，谈论共产党政策英明，深受人民的拥戴，共产党与人民心连心等等。但谁也不敢讲后一步应如何走。

在南京我还到前处长陈沛家。陈讲：“蒋委员长要在浙江丽水成立‘剿共’总队，可能让我去”。陈还问我到哪里去，我讲到温州等地，他叫我给他留地址，后来，我把温州的通讯处留给他的办公室主任张慕槎与管人事的王广木两人，就到了上海。从上海到温州，途中连饭都找不到吃，我感到很气愤，国民党统治竟然如此。

在温州玩了几天，大概十月份我到瑞安。

胡达新来瑞安接我，叫我到文成山里去，他说现在可以上山了，并把他所知道的有关文成共产党的情况都告诉了我。他对我走向光明的思想演变是有促进作用的。由于当时我的家眷尚未安置妥善等问题，没有去文成。

组建自卫纵队

我在瑞安住不到一个星期，接到张慕槎从丽水发来的一个电报，内容很简单：“急来丽水有要事商量”。第二天，我就动身经温州坐梭子船去丽水。一到丽水，就在街头看到一张布告，具名县长张慕槎。我就径直到县政府找他，张告诉我，陈沛已留在南京当卫戍副司令，不来丽水了，我说：“你在这里当县长，真是大材小用，有啥意思？”我问他叫我来丽水做什么？他说：“丽水的武器很多，就是没有人扛”。原来丽水的武器是李默庵的三十七集团军留下来的，约有六千多支枪，而陈沛是李的副司令。张慕槎的意思是想用这批武器成立一支自卫队。丽水原来是有一支约二百人的自卫

纵队的编制的。后来，丽水专员朱沛霖曾拿这批武器装备了两个营。当我第二次问他要我来丽水做什么时，张慕槎直讲了，叫我来做“刘、关、张桃园三结义”。要我来成立丽水自卫队。

以前，我曾想过带部队跟共产党走，但在陈沛统治的广州、南京等地进行是不可能的。如果以丽水为基地举行武装起义，困难虽然也有，但是有可能的。不过当时解放军尚未渡长江，国民党正竭力巩固江南，想起义仅是我个人的想法，正因为有了这个想法，我答应了。我对张说：“可以成立自卫纵队，你当正队长，管文的；我当副队长，管武的，权力要给我，否则我回温州去。”张慕槎倒蛮通融，立即同意并叫我着手筹建。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底，我开始组建丽水县自卫纵队。入伍军官是我和张两人从广州召来的三十多人，募收金华、丽水等地原来的散兵游勇。与此同时，我立即通知胡达新在文成、瑞安一带招收愿意背枪打仗的人，但不能叫乱七八糟的人来，人数越多越好。后来，达新改名

叫胡元光，先后带来二百多人。这样，自卫纵队共有六百多人。但丽水县参议院定的编制只有四百名，超编人员的军饷都是我和张出谋支付的。丽水自卫纵队建成后，我为了避开丽水专员兼保安司令朱沛霖的耳目，把驻地转移到碧湖。

率部起义前后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胡元光（即胡达新）到碧湖来与我联系，我写了一封信让他送给浙南地委书记龙跃同志。讲明我要率部队举行起义，投向光明，与共产党游击队一起推翻国民党统治。后来，龙跃同志也让胡元光带给我一封长达四张纸的回信。其实，当时我决心早已定了，回信只要写“欢迎你来”四个字就行了。

十一月下旬，南京电令朱沛霖，在丽水成立“丽、青、景剿匪司令部”，这可是个机会，可以扩充兵员了。于是我第二次写信给龙跃同志，叫他派五、六个连的人过来，要穿便衣、徒手，分散来。到丽水后，就把那批库存

的武器发给他们，这样便有五、六个连武装起来。我再叫胡元光把信送温州去，再三嘱咐要保密，尽量把人多带些来。当时朱沛霖也很想用这批武器扩充人员，以扩大自己的势力。也就是说，谁先下手，谁就先得到武器。

就在我耐心地等待龙跃同志回信的过程中，张慕槎有一个姓郭的同学从诸暨到丽水来看他。这人带来了一封浙东共产党负责人马青的信。这封信是给“路南”（即浙赣铁路党代表卜明）的，信上写着：“丽水的张慕槎是进步的，要争取。”等话。其实这是一个策略。

张慕槎是个文人，看到信后害怕起来，将信拿给我看，问我该怎么办。我叫他把信送给卜明，他问让谁送去合适，我说谁带来的再让谁送去。两天后“路南”派吕东明来了，张慕槎回东阳老家去，避而不见，因我知道内情，即由我来接待。就这样，我与浙东共产党也取得了联系。那时“路南”党代表卜明已先与松阳县长祝更生联系好了，在这种情况下，我更放心了，于是积极准备武装起义。

二月尾，我文成家乡的胡绍彩拿着我的手

令带领大岙、玉壶、岙口、营前等地的二十多人从温州方向来到丽水。过了一个星期，胡元光和田世朋又带来四十多人。胡元光未到丽水，浙东党派给我作联络员的吕东明对我说：松阳县祝更生准备马上起义了。当时，我感到很突然，部队还没有准备好呢。三月十二日下午，胡元光赶到碧湖，说他已带来四十多人了。那时，我的自卫队在丽水城内驻有一个小分队，二十人，他们的武器是最好的，怕调不过来，带不走。于是，我就写手令，叫田世朋等两人同带来的人赶赴丽水，以调防的名义，把驻在丽水小分队的二十支枪接收过来。

三月十三日下午，丽水的朱沛霖打电话给我，问我有没有得到松阳县的情况，我回他说没有消息，松阳也没有船过来。过一会，朱又来电话，说，现已查明，松阳祝更生叛变了，叫我从碧湖向丽水靠拢，这是为了我的安全，也是为了丽水的安全，我回他说：“知道了。”

事后，我得到了可靠的情报，松阳在十三日上午已起义，并把我的名字也挂了上去。朱

沛霖叫我向丽水靠拢，是为了吃掉我。我立刻写信，向广州、浙西、浙南的同事们表示，我“叛变”了，叫他们不要来。同时，通知胡元光，叫他在十四日下午去调防丽水城内的小分队。

十四日晚上，我独自一人决定起义，先叫我的亲信自卫纵队的下属大队长詹玉韦把部队集中起来，再去叫丽水县的主任秘书屠泽民，连叫他四次，才把屠叫来，即命令他跟我走。否则是难过关的。屠怕得发抖，只好跟着走。还有碧湖区长魏再思，也强把他带走，利用他派当地民夫为部队搬运武器弹药。

就这样，在起义之际没有开一枪，由吕东明带路，我指挥着这六百多名武装队伍，向丽水以北、宣平以南的大山进发，到了一个叫老竹的地方，与浙东游击队会师。

松阳祝更生的起义部队已在老竹，两支起义部队就地整编。我部编为丽水、缙云、永康、武义四县的游击支队，我为支队长，共产党丽水县委书记张子清任政委。祝部编为松阳、宣平、遂昌游击支队，祝更生当支队长，

共产党松阳县委书记林艺圃任政委。同时，还成立“路南”分区司令部。

震动了蒋介石

当时，蒋介石下野住在浙江奉化溪口老家。在他身边动武，不知他作如何想。但已震动了南京政府，立即派出嫡系第十一师（是汤恩伯直接指挥的蒋介石在奉化的警卫师），还有浙保六团，温州陈介夫的保安二旅，省保安团的两个独立营等四支部队来包剿我们。另外，还有浙江省主席周岩派他的胞弟周琦率部队到温州堵剿我部。我胡永孚的“通缉令”发满了浙江全省。就因我身为蒋家天下的芝麻官，却在蒋介石老家后院搞起义，真是官小名大。

当时，起义与反起义的战斗到底打几次已记不清了。有两次较大的战斗还记住。一次在丽水北面的岱后，包围与突围的战斗，夜以继日，一直伸延到宣平、缙云等地。我把支队分成两个大队：张子清政委带一个大队向北面的浙赣铁路靠；我带一个大队向缙云的东

北、江山、玉山一带靠，都是在转移的过程中打遭遇战。另一次是张子清带的大队，在武义北面的牛头山附近与敌军硬碰硬地打，大队长牺牲了，战士损失一百多人，留下来的队伍编到浙东武工队里去。当时，敌十一师的力量是强的，浙东武工队对付不了。浙东党决定我带部队到浙南去，与浙南游击队合作，向十一师反围剿。

我接到任务后，带着大队三百多人从义乌南部动身，经过宣平、松阳、遂昌、丽水、云和、景宁等地到浙南。到宣平与松阳之间时，以假停留，想把敌十一师的一个团引过来，减轻浙东的压力，可惜没有成功，仅有少数敌人追上来，被我部打散了。

和 平 解 放 温 州

我带着警卫班，先到景宁浙南办事处，碰上负责人张金发同志。第二天，我听到解放军已打过长江的消息，心里真高兴。在景宁住了几天，张用电台与浙南地委龙跃同志联系

上,由朱大孝同志送我经文成、珊溪、岙口、营前,在李山与龙跃同志会见,两人谈胜利,谈向光明,商量如何解放温州,如何解决叶芳的第二〇〇师等问题。过几天,我留景宁的二百多人的部队也来到了。部队抓紧训练攻城战术,夜里学文化。主要是为武力解放温州作好战前训练。

那时候温州叶芳的二〇〇师兵力也是较强的,浙南地委已作好武力解决和平解决两手准备,和平解决也必须以武力作后盾。经各方的统战工作,叶芳了解时局对他不利,同意起义投诚,不过该师的一个新兵团不同意起义,是经过战斗打下来的。

五月七日,我接到龙跃的参谋长程美兴的命令,叫我带部队到瑞安马屿一带投入战斗。原来驻文成的敌浙保四团也不同意起义,正向瑞安逃窜。当时我手下仅有二百多人,而敌人是一个团(按:实际上只有二个营),兵力悬殊,我问身边的联络员吴觉非,马屿有民兵没有,吴讲多得很,男女老少,全民皆兵,这一下,我放心了。

八日，我到马屿，敌浙保四团真的来了。我派吴觉非带几个人与敌团长接洽，叫他把部队就地停下来。并布置当地群众在生活上照顾四团官兵，让群众与四团兵士混挤着，劝敌兵放下手中的武器，空手坐船到瑞安去。而我把自己的部队沿途布置好，架上轻重武器，作好战斗准备。起先那姓韩的团长不同意，他手下的一个管长更坏，发牢骚，想带部队走。但当他们看到我们已作好战斗部署，也不敢轻举妄功，只好让我们缴了四团的枪，让士兵们空手坐船到瑞安去。事后，我从四团军官中获悉，他们是奉温州陈介夫的命令，叫他们经瑞安、平阳到福建下海逃台湾去的。

一九四九年五月上旬，温州终于和平解放了。解放后，浙南游击队作了整编，我部编到第一支队，我本人编到纵队司令部参谋处当处长，参谋长是程美兴。

不久，我接到华东军区调令，到南京参加起义军官集训班学习。结业后派到陆军第十五步校当系主任。一九五五年，转业到无锡市当税务局长，现已离休，是无锡市政协常务

委员。回首往事，历历在目。由于共产党的革命路线指引着我弃暗投明。现在眼看祖国欣欣向荣，切望台湾的同事们，在党统战政策的感召下，共同为统一祖国大业而努力，早日回到祖国的怀抱，否则，真会终生遗憾。

一九八五年五月七日于无锡

大岙镇商会沿革概况

刘 伯 超

一九一二年，民国成立，大岙隶属于瑞安县西区五十一都。那时西区只设立警察所，管辖行政及处理人民一切事务。

一九三〇年（民国十九年），瑞安县西区将大岙分置友助里、仁让里，同时开始设立瑞安县西区商会。商会设主席一人，由商民大会选举产生。每届任期三年。当选首届主席的是吴梅伍先生。在他任内，没有机构及办事处，也没有雇用员工，会务由他个人主持，办理区与商会和人民之间的联系，并处理商民内部事务以及解决纠纷等事宜。

一九三七年（民国廿六年），瑞安县西区警察所改为大岙区区署。友助里改为新岙镇，仁让里改为大岙镇。但商会仍称西区商会，只进行改组。改组后，经商民大会推选郑子华

先生为主席。他接任后，在中洲庙（现县前街和大岙街交汇处）设立办事处，雇用陈志飞为办事员，程鹏为杂工。并在大岙筏头对出口大米征收商会费，每袋米收大洋一角。正式开始办公。商会逐步走上轨道。

一九四五年（民国三十四年），瑞安县大岙区署，将新岙镇、大岙镇合并为大岙镇；西区商会改为瑞安县大岙镇商会。原商会主席，改称为商会理事长。郑子华先生辞职，由赵子珍先生继任大岙镇商会理事长，照常办事。同年，玉壶、珊溪两地相继设立商会。

一九四七年（民国三十六年）二月，赵子珍先生辞职，由赵沛孺先生继任，同年十月辞职，由我当选续任。我担任理事长后，仍请陈志飞为办事员，陈宗凤为杂工，在桥头庙设办事处，正式办公。

一九四八年七月，文成县政府成立，首任县长陈志坚。同年底，叶木青继任县长，视事不久，在县府礼堂召开大岙镇士绅暨殷商富户联席会议，讨论粮食调节问题及筹募县自卫队服装经费。决议成立县粮食调节委员会，由

王绍明先生任委员会副主任，郑子华先生任委员，在筏头征收出口稻谷每袋五斤，其谷由商会负责征收保管，吴锡丹先生是保管员，陈志飞兼记帐员，赵沛黎为征收员。先后征得稻谷一万多斤。当时时局已日趋紧张，县府和大岙镇千方百计用各种方法，想将这批谷吞用。我当时坚持要专谷专用，顶住各方压力，把它保留下来。一直到大岙解放，由县粮食调节委员会提出，作解放工作人员的粮食。这件事王绍明先生是经手人之一，一切收支帐目，都作了公布。这是我在商会中处理的一件自认为得当的事。

一九四九年五月，文成县解放。县委会驻在周村岳祺的楼房里办公，我前往县委将此事向朱大孝同志汇报，请求派员接管大岙镇商会。后在县委吴高谈同志和区委周日瑾同志的主持下，召开了工商界群众大会，吴高谈同志在会上作了讲话，阐明组织工商联的意旨。当即选出文成县大岙镇工商联筹备委员九人。他们是：王绍伦、张碎丁、陈钧、吴菹蓼、赵钦滴、郑柏龄、赵钦束、赵沛云有还我。并

指定由我与王绍伦担任主任，共同主持会务。

当时解放伊始，百业待兴。上级指示：先着手开始工商业分类调查登记，做好工商业调整的准备。由于税务机关尚未设置，一切税收，依估商人营业额，合理评定各业各户的税款，收齐上交，工作异常紧张。

一九五一年二月，进行土地改革，我因成份高，自动退职。大岙镇商会及工商联，收支帐目是王绍伦先生代表清算的。我的职务由陈永孚先生继任。

1986年9月15

大岙镇电灯厂创办前后记略

张雨明整理

一九四八年七月四日，是文成县历史上值得记载的一天。这天晚上，人们在大岙蟾背山县政府礼堂里，第一次看到了电灯。它表明，先进的电气化的苗苗，终于在偏僻落后的文成山区破土而出了，它宣告“火篾当灯点”的岁月，不久将成为历史的陈迹。

电灯离不开发电机，发电机还得有动力，因此，提到电灯厂，就得从文成县第一部动力机械谈起。大岙镇的陈麟如先生，是个附近著名的律师，经常往返于杭州、温州、瑞安等地，他见大岙群众加工米、麦，仍旧沿用千百年来水碓和人工手推脚踏，效率既低，人又辛苦，而在地外早已采用机器加工。在一九四三年，由他牵头集股创办了文成县第一个碾米厂，到温州买来12匹马力的立式木炭机（一

只缸)一台,二号碾米机斗砬各一架。厂址设在原河头殿(现前埕巷13号,县粮食局职工宿舍)。当时的股东,除陈麟如外,还有陈正豹、陈永行、吴三善等人。工人有陈正豹、陈永行、陈德存、胡绍柱等人。由于管理不善,于一九四六年关闭。与此同时,吴信履、王鸿亨、王绍乾等人在大岙河头边(现文成酒厂所在地)筹办了一个新的碾米厂,由王鸿亨任经理,实际工作由王绍乾统抓,原来碾米厂工人,大部分转到新厂。工人有陈正豹、陈永行、吴信豹、沈永林、胡绍柱等。设备有12匹马力的柴油机(由六只缸的汽车内燃机改装)一台,二号碾米机一架。

解放前,米厂曾发生一件轰动大岙镇的爆炸事件。土技师陈永勉不知从哪里弄来一个炮弹头,无法打开,就把它放在砬糠堆上用火煨,打算用高温使弹头中的锡熔化,谁知,到半夜里,一声巨响,弹头爆炸了,响声吓人,当时驻扎在大岙区署(现文成中学所在地)的浙保四团,以为共产党游击队攻打大岙来了,惊慌失措,连夜戒严。第二天要在大岙

进行大搜查。陈永勉老师怕连累别人，前去投案，结果被五花大绑，游街示众，到王合吉六房门口，陈永勉老师被按倒在街上打屁股，打断了两根扁担，屁股被打得血肉模糊，惨不忍睹。最后，请大岙镇的绅士出面担保，才获释放。

一九四八年，大岙与黄坦都在争取作为文成县城所在地而努力，大岙组成“文成县建设委员会”，主要负责人陈麟如、王鸿亨等人，为了创造更为有利条件，决定举办大岙电灯厂，拨出一万斤稻谷作为电灯厂基金，同时于一九四八年六月上旬，召开大岙镇工商界会议，讨论集股办电灯厂事宜。由于大家踊跃投资，不久即集结了八十股（每股先筹稻谷一百斤，另加川旅费六斤），合资经营。包括“建设委员会”的一万斤，共计筹集到稻谷一万八千四百八十斤，推选赵钦政为电灯厂经理兼会计。事后，由赵钦政、王绍蒙二人去温州购来一台六瓩的发电机和一批电灯器材，共化去稻谷三万二千七百三十二斤，超支部分，由赵、王二人垫付。

电灯厂厂址是和碾米厂一起的，同在河头边。白天碾米，夜里发电，所以群众都叫“米电厂”。实际上，电灯厂和碾米厂在经济核算方面是各自分家的，不过电灯厂的动力是借用碾米厂的柴油机。电灯厂除从温州、乐清聘来郑余澄、叶宝生两位老师专管发电外，同时还请碾米厂的工人沈永林、陈正豹、胡绍柱等开启柴油机和上皮带等工作。七月四日那天晚上，为了庆祝县政府成立，摆了十多席酒，宴请军政官员和著名乡绅，却没有邀请陈永林、胡绍柱等三位开机器的工人入席，他们在一怒之下，离开电灯厂跑到珊门桥下乘凉去了。厂里无人开机器，电灯也开不了“花”，急得经理赵钦政到处找人，后来由大镇镇长吴信履出面讲情，答应第二天请三人到餐馆吃一顿，三人才回厂工作，庆祝会夜晚的电灯，总算亮堂了。

电灯厂开办初期，线路不长，上至大岙街的桥头井，下抵土地坦，外达筏头，内通县政府，仅有灯头七十来盏（有的说开始有三百来盏，后来减至一百来盏）。由于电灯费收缴不

起，成本高等原因，开办三个月，亏损稻谷一千八百多斤，没有资金，无法维持，只好关闭。此后，曾召开股东大会，讨论电厂的前途问题。当时股东们普遍认为：用柴油发电，成本高，利润少，加上工资等支出，看来有亏无盈。因此，大家不愿继续投资。为了解决赵钦政、王绍蒙二人的垫款问题，股东们讨论决定：已投股金，作为亏损牺牲，多不退，少不补，电灯厂中的所有设备、器材，都抵作赵、王二人垫款之补偿，今后电灯厂归属赵、王两人所有，原来股东，全部作退股处理。当时每个股东还都盖了印章或指印。至于“建设委员会”自从文成县政府成立后，已经无形解体，它所拨的一万斤稻谷已购置电灯厂的设备，归电灯厂所有，无需偿还，此后全部由赵钦政、王绍蒙二人包揽。不过大家还向赵、王二人提出一个条件：电灯厂虽属二人所有，但是发电机等设备，不许运往外地变卖，只许留在大岙使用。

大岙电灯厂，从创办到退股，先后仅四个来月，后因赵钦政患病，资金短缺等原因，长

期停工，直到1951年春，由县人民政府接管后，电厂才恢复了生命力，并且获得迅速的发展。

注：这篇稿件，材料都由赵钦政、沈永林、胡绍柱等同志提供。由于时日较久，定有错误和遗漏之处，祈知情者修正、补充，使电灯厂的史实得以完整。

日寇轰炸大岙街目击记

陈 夫

抗日战争期间，我国大部分国土沦陷于敌手。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的铁蹄到处横行践踏，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罪恶累累，罄竹难书。文成县地处山区，既无矿藏财富可抢；又无军队驻扎或军事设施；亦非战略要地；加以交通不便，本应可以避免战火的蔓延，然而，它仍然逃不出侵略者的魔爪。1941年文成县大岙镇惨遭敌机轰炸，死四人，伤三人，烧毁民房数十间。

1941年4月19日，日寇在瑞安县城登陆，县长吕律即率领县府机关人员逃迁大岙（当时文成县尚未成立，大岙镇属于瑞安县西区）。同时，一些企事业单位及老百姓也“逃反”到大岙、珊溪、泰顺一带。大岙街挤满了人。一些学校、祠堂及较宽大的民房都住满

了人。我当时正在现县立小学的前身群益小学读书，校舍也被住占。同学们都搬到附近的祠堂屋去上课。我的班也跟班主任吴鸣皋老师搬到周村现栖云路松山巷11号原周家宗祠里。

日寇在瑞安登陆后，接着侵占了温州、平阳。小汽艇在飞云江中追逐，直逼马屿、平阳坑。飞机在我县上空嗥啸，大岙街处在一片恐怖的气氛中。也有一些胆小的人家逃到山头亲戚家去躲避。弄得人心惶惶，不可终日。

4月23日是古历四月初一、星期六，一早，许多老百姓都到泗洲桥的五显爷庙、张老爷庙和娘娘宫烧香拜佛，祈求菩萨保佑。那天上午两架敌机来侦察一番飞走了。下午我和哥哥请假回樟岭老家。我们走到新亭时（当时新亭并无村，只是溪滩洋上孤零零的一个路亭），亭里有许多人，一些从瑞安逃难的人们正在诉说日寇登陆后的种种暴行，我们兄弟也挤进去听。那时大概在三时左右，突然听到一阵隆隆的声音，两架单螺旋桨双翅膀的飞机从黄泥岗头山顶冒了出来，直扑大岙街，飞得出奇的低，我们站在亭外溪滩的柏子树下，不仅可

以看清飞机翼下的太阳旗，也看见了坐在驾驶室的飞行员。机声也特别刺耳，大地都被震动。这时，有个瑞安人惊叫说：“不好，是轰炸机，要抛炸弹的”。但是好多人都不相信，只见飞机在大岙上空旋了一圈，突然往下俯冲，接着尾端落下一个黑点。有人喊道：“飞鸡（机）生卵了”！敌机就这样俯冲几次，投了几个炸弹后，即向海口方向飞去。随后，那些大人们都向大岙镇跑去，只见一阵浓烟夹着火光正在大岙上空冲天而起。

第二天，我也跑到大岙。街上一片混乱，许多人都打算逃到山头去。那些从瑞安一带逃来的外地人更是狼狈，他们万万想不到这样的山头昏晃，也会遭到空袭。我从大人们的话里得知昨天下午飞机先后在三处投弹。开始在周村王家老屋（现县后巷县府宿舍，原门台尚在）墙围内投了一颗炸弹，一条天井阶石被炸断飞到屋檐上，当时正在大门边的老人王老七头部被条石击碎的瓦片击伤。同时在围墙外的稻田里也投了一颗，炸了一个径大二米深达二米的大坑。我们读书的周家祠堂就在这个稻田对

面山脚。飞机来时吴鸣皋老师正在上常识课，他即带领学生逃到右边山脚一株大樟树下，飞机投弹时，他们分明看到炸弹往自己头上掉，这一吓非同小可，吴老师即将身体扑到几个学生身上，只听到轰的一声，炸弹就在离他们一百米外的稻田里爆炸。这件事吴老师在四十年后回忆时，脸上仍露出紧张的神色。第二处投在桥头下新屋(现大岙街445号)围墙外麦田里。现县财税局吴正龙同志那时正好从蟾背山看球赛出来，飞机来时他伏在现新屋巷口另一块麦田里，炸弹炸开的泥沙撒满了他一身。在下新屋墙围里面正伏着陈永谷老人，整个身体被震跳起来，所幸围墙未塌，不曾受伤。第三处投在桥头井旁现水碓巷口，那里原来有一门水碓，飞机来时，有一个富岙人姓严的警察正在那里，他看到飞机这样低，就用步枪向飞机开了一枪，于是就在水碓那里丢了燃烧弹，并扫射机枪。结果这个警察被炸死，同时被炸死的还有里阳人陈体顺、岚岩一个卖另食的妇女，他们两人是逃避在那里的。值水碓的刘开显老人逃到水涵洞里，也被炸死，

他儿子刘际岩受伤。这一处轰炸后，即引起大火。由于当时飞机尚在盘旋，大家不敢救火，致使火苗迅速蔓延，一直烧到现在文成中学下首当时叫三官官，才被扑灭，共烧毁民房数十间。

文成上空没有航线，平时很少见到飞机，在三十年代，许多人还把飞机叫做飞艇或飞轮。飞机经过时，大家争着跑到野外，一边观看一边议论，作为趣事。但此次轰炸后，血的教训使人大大改变了看法，只要再听到飞机声甚至别的类似的声音，也就赶快逃命了。我曾到现场去看到被火烧后的尸体，只见黑团的一块，已无人形，惨不忍睹。至今那形象和飞机刺耳的声音仍如在目前耳际，每当想起总是不寒而栗。

大岙街被炸后，“山头好逃反”的幻梦扑灭了。在馒头山（现文成气象站）上挂起了一口从七甲寺搬来的大钟。飞机来时，即敲钟报警。我记得空袭的钟声是二长声，大家听到钟声即向野外山头逃跑；飞机到后即发紧急警报，钟声是连续短声，大家就地隐蔽，不准

再乱跑；飞机去后又敲解除空袭信号，钟声一长声，大家重新回家。这以后虽然再没有敌机来轰炸，但每次一来敌机，那口丧命钟就急促地敲起来，大家也跟着拼命地逃。这种提心吊胆的日子一直过了很长时期，那口钟也一直挂在山上，敲了很长时期。

（本文曾访问吴鸣皋老师、吴正龙同志以及桥头井房屋遭烧的刘伯超先生等老人，作了校对。）

忆我的伯父叶均居士

叶 方 贵

中国佛教界的南传佛教学者我的伯父叶均居士，系文成县岙口区双桂乡城底村人，一九一六年七月二日生，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六十九岁。

我的伯父出身在贫农家庭，他资质聪颖、酷好佛学，还写得一手好字。他从小就离开故乡，四处奔波，后来离别祖国赴国外留学，对佛学研究有高深的造诣。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四年在宁波观宗研究社学习，一九三五年在杭州云居山佛学院研究，一九三九年至四〇年在天台研究社研究，一九四一年，当时正值抗日战争时期，大半个中国领土被日本侵略军所占领，他不愿在敌人的刺刀下过那种屈辱的生活，辗转奔赴抗战后方——重庆，进入当时佛教界的最高学府汉藏教理院深造。一九四三年

暑假期间，他未等本科毕业，即被院方派往合江县法王佛学院任教，一九四五年又转任成都十方堂佛学院教席。抗战胜利后，于一九四六年五月，他被汉藏教理院派往锡兰（斯里兰卡）留学，专门研究巴利语系佛学，并被授予“论师”学位。一九五七年因赵朴初会长邀请回国，在中国佛教学院任教，并任“上座部研究生导师”。一九七三年以后，一直在中国佛教协会研究部从事研究工作，任中国佛教协会理事、常务理事。

我的伯父性情温和，待人真挚诚恳，作风正派、谦虚谨慎。在政治上，他一贯热爱祖国，深明大义，拥护中国共产党。一九五七年赵朴初会长访问斯里兰卡，约请他回国弘法，当时新加坡、马来西亚佛教界亦邀请他去新、马，并为他办妥了入境手续，是回国还是去新、马，当时在他的思想上确实有过很大的踌躇。以他当时的学识，身份去新、马，无疑会爱到更为优厚的待遇。但是祖国的解放，人民当家作主，轰轰烈烈的建设事业，对他来说更加具有吸引力，由于他对祖国怀着一颗赤诚

的心，他毅然决定选择了回国的道路。

我的伯父叶均居士的一生，是求知的一生。他孜孜不倦，学而不厌。他在学术上的成就，与他一贯追求进取的精神是分不开的。他的佛学造诣很深，巴利文和英文也都有相当水平。在回国以前，他就翻译出版了南传佛教的《法句经》。他的最重要的译著是觉音的《清净道论》，共约六十万字，已由中国佛教协会出版。这部书是南传佛教的重要典籍，一千多年来，中国一直没有汉译本。伯父为了译好这本书，花费很大的精力。据他说：五十年代初学此《论》时，即边学边译，此《论》学完，他的初译稿也就出来了。回国以后，他曾用这部译稿作为课本在中国佛学院讲授。在讲授过程中，他又按照巴利原文仔细核对。出版前，又花费许多精力和时间，亲自校稿，务期做到忠实于原义，避免差错。《清净道论》的译出，填补了汉译佛经史上的一项空白，对佛教学术研究具有深远的意义和影响。他的另一部译稿《摄阿毗达磨义论》也已出版。他的未完成的工作还有《汉巴辞典》，他生前自知无力完成这部

《辞典》的任务了，于是就将编好的部份稿件移交给他五十年代的学生法映法师，并委托中国佛教学院教务长传印法师协助法映继续设法完成这部书的编译工作。

由于我的伯父年迈体衰，近几年他的主动脉长了很大的血管瘤，经常发病，他总是忍着病痛，坚持工作。他常对孩子们说：“我在世的时间可能不长了，要尽快搞些东西出来，为我国佛教界留下点财富”。就这样，在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这位佛教巨匠离开了人间，中国佛教界人士无不为之惋惜、悲痛。赵朴初会长亲笔为他题了挽诗，其挽诗全文如下：

叶均居士挽诗

忆昔逢君师子国，端严犹是比丘身，为明宿志拈红豆，应请归航转法轮。二十八年桑海换，百千万劫性情真，翻经功毕应无恨，及见中华气象新。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赵朴初和南

一、一九五七年余游斯里兰卡，与君初相见，尚与君偕行，经红豆树下，余问：有故国之思乎？君拾落子数颗为赠。旋应余劝请回国。

二、君译南传佛教要籍《清净道论》及新译《法句》，三年前由中国佛教协会出版流通。

为了实现我伯父叶均居士生前的遗嘱，其子叶辉（堂弟）、我和中国佛教协会负责人等一行四人，怀着无限悲痛的心情将我伯父的骨灰送往温州，于一九八六年一月十一日在温州瓯江举行骨灰撒洒仪式，实现了他老人家生前的遗愿。

中国佛教协会理事我的伯父叶均居士虽然与世长辞了，我想，他那种为人正直、品德高尚的作风，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态度，治学严谨、一丝不苟、尽忠职守的工作精神和佛学著作却流芳百世。

于一九八六年十月

葉均居士挽詩

憶昔逢名師子國端嚴
猶是比丘身為明宿志
拈紅豆應請歸航轉法
輪二十八年桑海換百千
萬劫性情真翻經功畢
老無恨及見中華氣象新

元亨年十二月二十日

趙傑初和南

一 一九五七年余遊斯里蘭卡與君初相見
嘗與君偕行結紅豆樹下余問有以圖之
思至君始落子數粒為贈茲在余初請
歸國

二 君評南傳佛教要籍《清淨道論》及新
譯《法句》三年前由中國佛教協會出
版流通。

编 后 话

第二辑《文成文史资料》与读者见面了。

这一辑《文成文史资料》仍然是综合性的，但偏重于学校教育方面。上辑的《文成文史资料》中，我们刊登了县立中心小学的前身——文成县第一所小学群益两等学堂。事实上，县小是由“群益”、“承文”、“广益”三所小学合并而成的。为此，我们在这辑《文成文史资料》中，继续刊登了“承文”、“广益”两所小学以及县城——大岙镇在民国初期的一些小学的有关史料。同时，还刊登了文成县第一所中学的演变史料。这样，大家就能比较全面地了解县城在解放以前学校兴办的一般历史。

抗日战争期间，由于我县地处偏远的山区，是我省没有沦陷的地区之一，许多沦陷区的机关、学校都迁到文成来。在文成的历史上，这是一段比较繁荣的时期。我们把当时迁来的英士大学、省立联高、温一中、浙东三临

中等校的有关史料，也在本辑里作了介绍。

我们在上辑里发表了《文成建县始末》之后，又收到了刘兆祥先生写于台湾的《文成县诞生·回忆鳞爪》，提供了一些外人难得了解的史料，在这里予以发表，供读者参考。

《文成文史资料》出版以来，受到了各方面的关照，这给我们很大的鼓励。当前，一项非常紧迫的任务，是如何做好我县文史资料的抢救工作。文史资料工作要为历史研究服务，为四化建设服务，为两个文明服务，为扩大统一战线服务，仅靠现存的史料是远远不够的，需要补充更多，更丰富，更有价值，更富有教育意义的史料。但由于自然的法则，我县的现代史的“三亲”者大都年事已高，确实面临“人去史亡”的现实问题。希望大家引起高度重视，同心协力，把这一工作做好。

